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国家起源研究述评^{*}

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考古学为中心，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考古新发现的数量与性质令人欣喜，相应的研究也开拓出不少新的领域。综观这段研究史可以发现，考古学家从研究社会的角度，以历史学、政治学的语言去描述考古学学科的材料，体现了考古学学科的进步；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家则采用考古学材料去构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理论模型，完善与修订相关概念，说明考古学材料实际上已经成为早期国家研究的核心与导引。

关键词：国家起源；文明起源；理论；概念；研究方法；整合研究

国家起源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实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很难截然分开。对中国来说，国家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等同于文明起源。对于传统文献史学，这个问题似乎可以是不证自明的；但对于现代史学，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文献记载支离破碎无法在现代史学方法论中得以自明；另一方面，因为讨论对象差异、学科背景不同、学派师承有别所造成的理解分歧，诸如“国家”、“文明”之类的基本概念与阐释理论长期以来人言言殊。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国家起源研究都处在不同学科各自表述的阶段。

“解决问题的希望在于开辟新的史料来源”，^[1]史料的扩充带来了学科范式的转移。考古学出现并介入中国上古史重建研究之后，中国古代文明、国家建立、形成与早期发展研究的重任逐渐向考古学倾斜。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的提出，是伴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与基础材料的积累而逐渐明晰起来的。可以说，无论是理论阐释、传统文献史学梳理，还是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复原推导研

究，最终都会逐渐使用考古学物质文化遗存材料完善自身论证。

至20世纪末，无论学科背景有怎样的差异，中国学术界基本认可了当时考古学基本认识——在新石器时代最后的500年期间，长江、黄河、西辽河流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成员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尖锐乃至导致暴力冲突明显的时代特征。在这个被称为“龙山时代”^[2]的阶段中，可能是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时间点。同时，各地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与研究固有的、所谓的，平等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认识迥然不同，如何理解当时的社会状态，对于所有的学者而言都是新的挑战。^[3]

至20世纪末，基本考古材料给国家起源研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新问题：第一，伴随着区系类型理论在考古学界的广泛认同，少数考古学家开始思考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模式是否经历了其他文明起源的道路，换言之，中国文明研究是否可以采用其他古代文明发展阶段的研究理论、模

^{*} 本文的删节本曾发表于日本《中国史学》杂志第二十四卷（2014年）。本次发表亦经删节，因篇幅所限，删去了所有考古发现的相关注释。



型甚至术语。这种思考影响下的“多线进化论”从1996年前后开始，在新世纪逐步由考古学界扩展到整个中国学术界；第二，从进入文明或国家阶段与否的“定性研究”，转入对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探讨，亦即开始思考在物质文化遗存所表现出的物化形态背后，文明起源的过程如何，文明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样态与运行机制究竟如何，不同地区的演进过程是否走过了相似或相同的道路，是否基本同步；第三，中国古代文明、国家起源与文献记载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契合。

回顾新世纪以来的研究过程，可以这样说，以考古学探索为核心，中国学术界对上述几方面问题探索有了一些新突破。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论，赵辉已有非常准确而精彩的论述^[4]，本文讨论并未能超越其判断。新世纪以来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虽非汗牛充栋，数量也着实不少，对十余年来学术史的梳理述评，似乎仍有必要。因此本文不揣浅陋，以求教于方家。限于篇幅，仅就目力所及的重要研究略作评介。^[5]

一 理论探索

实事求是讲，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探索，并无决定性突破，也并非中国古代文明或国家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与研究主流。大略而言，新世纪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理论讨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主张采用或借用国外既有理论来总结中国文明或国家形成的状态；而另一种，则对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得的规律性认识更为执着。若从学科背景角度观察，前一类学者以文献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主，而少有考古学家；后一类学者则基本上以中国的考古学家为主体，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占据了新世纪中国文明或国家起源的主体。

对中国古代文明或国家起源理论问题的探讨，新世纪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围绕“酋邦”等概念而起的论争

对理论问题持有热情的学者虽然人数不多，但讨论十分热烈，争论却也偏偏是在他们中间展开。在持续的论战中，基本上看不到考古学家的身影。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前王朝阶段的社会形态如何定性，并无严密定义的概念和行之有效的

研究范式可供参考。是改用古代文献中的词汇还是用国外理论的既有定义，理论探索的学者们在学术界的趋向也截然不同。对于没有接受过考古学训练的研究者而言，采用国外现成的理论模型与概念似乎不啻为一个选择，其中最为他们所常用的概念就是“酋邦(chiefdom)”。由于对概念理解的逐步深入与辨析，易建平、谢维扬、范毓周、王震中、陈淳、沈长云等学者之间，相互展开了较长时间的论战。

较早使用酋邦概念描述中国前王朝状态的是谢维扬，其代表著作《中国早期国家》^[6]出版后，酋邦概念开始被关注。但是，西方学术界中“酋邦”概念本身含义繁复并无定论。大体而言，其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五点：规模比部落大；社会已经出现“分层现象”；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水平较部落社会为高，开始有“集约化”的因素；出现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以“酋长”作为权力结构中心；作为联合体成员的部落可以不具有血缘联系。在五项特征中，谢维扬所援引的更侧重于第四项，在此基础上，参考其他四项特征，构成了他的中国早期国家“酋邦模式”的主要特点。显然，正是由于对第四项的强调，引发了他与以易建平为代表的其他学者之间关于中国早期国家是否专制的讨论。

易建平的研究并未直接针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但他对摩尔根、塞维斯、弗里曼等人原典的深入解读，对“酋邦”、“古代国家”、“早期国家”等概念的一系列辨析与词源学分析，^[7]指出了谢维扬对酋邦理论理解的一些偏差，这种概念的厘清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研究有极大的助益。2014年，他旗帜鲜明地总结，“从词源上看，‘文明’即‘国家’……所谓‘文明’社会，也就是‘国家’社会，而不是考古学家认为的什么城邑社会、金属社会、文字社会、大型建筑社会、礼仪社会，等等。只有在比较的基础上，充分证明城(市)、金属、文字、大型建筑、礼仪等等与国家社会的结构相关，它们才能够作为国家产生的证据，用来证明文明的起源”。^[8]可以很明确地看出，他反对采用物化标准判断社会演进的阶段与程度。他强调“武力的合法使用权”对于组织和社会公共事务权的作用，国家根据对武力合法使用权的掌控能力，可以区分国家

的成熟程度。但他也提示，要将“武力合法使用”作为判断国家起源的标准，则酋邦理论也需要予以相应调整，否则，酋邦的经典论述会与国家的初级阶段产生重合甚至矛盾。

谢维扬认为中国早期国家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指早期国家直接从氏族社会中演化出来的那些个案，这可以称为“氏族模式”。第二种则是指早期国家是从氏族社会解体后出现的酋邦社会中演化出来的那些个案，这可以称为“酋邦模式”。在谢维扬看来，第二种模式是中国古代较为普遍的国家演进模式，^[9]“早期国家”应该是关于国家形成以后的状态，前国家状态的社会都应称为“酋邦”社会。他认为史学界对夏商周国家在整个古代中国国家制度演进中的成熟程度估计过高，或者过于忽视其“原始性”或早期性的特征（尤其是对夏、商），应该考虑具有完整的疆域概念和疆域制度这个指标。在这个指标上，三代国家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完整、不确定等早期性特征，只能作为“前国家复杂政治制度”，亦即“酋邦”。^[10]

沈长云认可酋邦理论与概念，他侧重于用文献记载解读酋邦理论，认为酋邦可对应于中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天下万邦”的“邦”，这种氏族结构不仅存在于中国前国家时期，也存在于国家刚产生后的一个阶段。^[11]他认为，中国古代国家应属于现代人类学者所称的早期国家，仍普遍存在着各种由血缘亲属关系结成的社会组织，酋邦作为基本政治单位也仍然存在。夏商周三代，是先后由夏后氏、有商和有周三个酋邦建立的国家，夏可以看做是中国第一个早期国家。与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演进道路相似，四川盆地的三星堆国家也属于酋邦统一后的早期国家。^[12]

范毓周不主张使用酋邦概念。他认为，文明形成的标准直接关系到文明起源研究中要确定的文明要素，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张光直所提出的“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复杂礼仪中心”六标准与夏鼐先生提出的“文字、都市、青铜器”三标准可以统一。他认为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上，使用弗里曼的社会分层理论会更为方便一些，但他也主张最好创造出一套大家比较认可的本土化理论概念。^[13]

陈淳对“酋邦”等理论的原典定性阐释进行

了充分论述，但并没有强烈地显现出使用何种理论与概念的倾向。^[14]他认为中国学者对早期国家起源的探索，无论是学术规范还是研究方法与国际同类研究都有较大的差距，要改变现有状况，并不是在于寻找更多的原始材料与考古证据，更不能囿于前苏联五阶段社会进化模式，而是在于更新理论方法。他认为原始国家的特点在考古学物质文化遗产中很难直接得到印证。

王震中先后提出了文明与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进入国家社会之后的“邦国—王国—帝国”说，以及“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说。“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可视作是对酋邦等理论的扬弃，他希望通过考古学“中心聚落形态”理论来解决从史前向早期国家过渡阶段的社会不平等、阶级和阶层起源的途径、社会组织结构和权力特征等问题。他反对使用城市、青铜器等物化标准的出现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而采用“抽象标志”说，将国家起源规定为“阶级的存在与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但他又十分强调都城作为国家的物化形式的考古学标识意义。他不赞成那种四级聚落等级形态表示国家已形成的标准。他认为“黄帝时代是国家诞生前夕的‘英雄时代’……颛顼帝尝尧舜禹时代属于早期国家时期……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国家”。他不赞成易建平，认为有阶级分化虽然未必会必然产生国家，但国家形成必然会有阶级的分化，凉山彝族的民族学个案，不足以作为国家形成理论的反证。^[15]

上述意见，基本上代表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理论界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思考。另有不少讨论，实际上是对上述几种主要观点的具体阐释，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下的社会进化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在当今中国史学界仍有一定影响，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代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五种社会形态认识，对于中国学术界探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研究仍有强大的影响力。新世纪以来，面对以“酋邦”理论为代表的各种新理论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新检讨，也重新成为一个新热点。



易建平重新审视了原典,指出从部落联盟到国家这一模式不是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观点;部落联盟不是原始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而民族才是;包括希腊罗马早期的人类社会是通过民族而不是部落联盟形成国家的。^[16]他介绍了弗里曼的社会分层理论,并将之与塞维斯的酋邦理论进行对比,认为前者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论的影响更大,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重要意义。^[17]张童心检讨了摩尔根理论和柴尔德文明判断标准,认为在既往研究中,过于依赖摩尔根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早期国家的实际问题。^[18]沈长云认为,古代国家形成的研究既要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也要符合现代人类学家的国家形成理论,恩格斯理论中“按地区划分他的国民”和“公共权力的设立”两项标准不能放弃。^[19]

王三义不同意易建平的分析,他认为部落联盟演进到国家阶段仍然是较为普遍的社会进化模式,但希腊罗马社会的确是从民族进化为国家的。^[20]杨共乐认为恩格斯所指的国家起源过程中“不可调和的对立面”所指的不是指奴隶主与奴隶;阶级斗争也不是国家产生的唯一根源。^[21]王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内试图对中国的国家起源提出哲学角度的理论思考,将中华文明的渊源与未来分为“源头论”、“基因论”、“创新论”三部分^[22]。以袁方成、张翔^[23]等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氏族的作用,认为氏族在不同的国家起源模式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叶文宪认为“文明起源”不等于“国家形成”,国家起源途径多元,文明形态也无统一模式;他强调恩格斯五阶段论但也认可酋邦论,认为奴隶制国家并不能称为文明社会。^[24]李宏伟认为酋邦应该是较为普遍的一个阶段,也可以称为分化社会。^[25]韩东屏认为,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理论不是关于全称国家的起源理论,而是关于阶级性国家的起源理论,国家就起源于有专职公管人员和常设公管机构的制度安排。^[26]晁天义针对摩尔根、恩格斯国家产生必然以血缘因素削弱,地缘因素的强化为前提的理论,以人类学的材料举出反证,认为史前社会向国家时代过渡的进程中,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均可能成长为政治性团体。^[27]

(三) 国外经典论著的译介

为了在中国学术界进一步蠡清、甚至是普及西

方相关理论,对西方原典的译介在新世纪就显得尤为很总要。因此,有关考古学历史、理论、实践的经典性著作,开始陆续以中文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学者的面前。一批国外考古学家的著作陆续被翻译出版,《南方文物》、《东南文化》等专业期刊对国外考古研究的新理论和新的个案研究也及时予以推广介绍。凡此,对正确理解相关概念,讨论中国古代早期国家起源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 对中国传世与出土文献的重新审视

前述理论概念的论争,都是基于西方文明产生的阐释体系分歧。相较于西方理论在新世纪热烈的讨论,对中国传统文献史学材料的研究就要沉寂一些。虽然与文献相联系的研究不是主流与热点,甚至将某种考古遗存与古代传说帝王、族群相比附的研究在新世纪中仍然不少,在新世纪也出现了一些新趋向——以出土文献材料赋予新的考古发现性质解读,是新世纪最突出的变化。此外,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将西方理论尤其是酋邦理论与中国文献相结合,寻找二者甚至于再结合考古资料后的新对接模式。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组织专家集体协作撰写的《古代中国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28]试图从理论、考古材料与文献三方面相结合去探讨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问题。但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论证方法与论据差异,全书对夏王朝是国家没有异议,但对于早期国家之前是否存在酋邦,态度游移不定。对国家形成过程中各阶段的定性所选用的概念,是英雄时代、部落联盟、酋邦还是中心聚落,全书前后亦并不统一。

晁福林认为古代中国的早期国家起源走的是一条各部落各氏族和平共处的道路,而非是通过酋邦模式演化的。这个演化过程很长,五帝时代是起源阶段,夏商时期是发展时期,西周春秋时期则是成熟阶段。^[29]王奇伟以《史记·五帝本纪》作为分析对象,认为龙山时代即相当于五帝时代,应该进入了国家阶段。^[30]尹宏兵赞同酋邦理论,他将中国国家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原始国家的起源与初步发展时期,大概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约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后期大概相当于尧舜禹时期,最后在大禹时期完成了从原始国家向早期国家的转变,约相当于龙山时代。^[31]缪雅娟认为中国国家起源

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在诸多考古学文化竞相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王朝文明首先形成，和历史上记载的洪水问题密切相关。^[32]袁建平以长江中游地区为具体分析对象，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经历了“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阶段。邦国是以古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式地方性国家，方国是邦国联盟体的地区性国家，即由一个较大的核心邦国联合周边邦国，或武力征服使一些邦国处于从属或半从属地位。“多元一体”的应为邦国文明的多元，“一体”则为王国文明的一体。黄河中游地区邦国文明起源于仰韶文化晚期，晚于长江中游地区，但后来居上，经历了酋邦—邦国—方国—王国—帝国这样典型、完整的国家形态演进阶段。^[33]王晖认为尧舜之前是氏族部落林立的时代，之后由部落联盟过渡到早期国家阶段。治水工程使劳动力归禹统一调配，使天下氏族部落产生了向心力，这是夏发展成早期国家的主要原因。^[34]

新世纪文献史学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研究的另一个新倾向是利用出土文献探讨早期国家或文明史。比如遂公盃的意外发现，提供了大禹治水传说的最早文献依据^[35]，这也为如何看待夏代是否存在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思考。诚如李学勤所言，至少在西周时期，当时人已经认为黄帝时期有了国家制度。^[36]

对文献史学在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与文明起源研究方法上做出总结性研究的，是李伯谦，他对考古学文化、传统文献史学古史体系以及人类学的社会形态进行了拟合。他认为尽管不同的体系使用的符号概念不同，但古史体系不能说完全是子虚乌有，应有其合理成分在内。^[37]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以传统史学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学者的态度。

对传统史学文献与考古学文化材料的拟合，学术背景不同、研究取向不同甚或学术心态不同的学者，态度泾渭分明。传世文献中，对“国”的表述，似乎有两重含义，一重表达了中心有围垣设施或者城的建筑，周围有从属村落的聚落形态，因之，文献有“国”、“野”之分；另一重含义则更进一步，讲的是具有统辖关系的聚邑可以称为“国”，也可以同称为“邦”。无论取哪种

说法，都需要落实到不同等级的聚邑以及城乡、城野关系之上。假若观察从仰韶晚期以来的城址修筑和区域聚落形态结构来看，类似“天下万国”的传说，或有“史影”。

无论何等的学术取向与概念辨析，终须回到实际问题的疏证。原史时期文献，或有口耳相传的芜杂，也必有对英雄帝王先代始祖的神话溢美。倘若因这些枝末，而对春秋以降的文本一概采取“疑古不论”的态度，恐怕也非“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既不能因为缺乏同出可辨识文字文本材料的自证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另一方面，更不能削本土材料之足适他文明理论概念之履。

名相论争十余年，坦率讲并没有也不会达成共识。一方面，理论定义的正本清源，帮助中国学术界明确概念的能指与所指，纠正既往误读，论争有其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学者的分歧，也可视为他们是在竭尽全力从自身的学科体系出发去构建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的样态。

更进一步地讲，对理论问题的执着，还有一层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或者“对话”的意味蕴含其中。正如陈淳所主张的那样，若不应国外理论与范式，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只能是自说自话，永远不能融入国际学术界，也无法对国际学术做出中国的贡献。以“世界态度”视之，中国问题的研究终需面向全世界。

但对中国文明与国家形成这个具体问题而言，也应清醒地意识到，类似“酋邦”这样的理论，都旨在归纳整个人类社会普遍性规律。“产生在西方资料基础之上的概念在是否可以恰如其分地概括中国文明的性格方面，是大可怀疑的”，^[38]且不说这些理论概念抽象或归纳的过程中，有无中国或东亚材料参与提炼；单就中国之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局部案例而言，其重要任务之一是要解决“何以中国”、“何以东方”的问题。若开始就以广义人类学角度，套用国外理论，则“中国”的特殊性，便已从根本上被抹杀了。

正确的研究态度，似乎甚至必然应该是，先做有关中国的历史研究，再做横向的比较研究，最后去抽象总结所谓的一般法则或规律。对中国不同时期各地区具体的情况与发展道路都没搞清楚，就急急忙忙搞比较，定模式，谈规律，研究的基础必然不太牢靠。不同学科背景学者对看似



相同的问题，所要解决的目标并不相同，出发点不同、话语体系不同、论证方法不同、选用论据不同、目的不同，当然会带来研究结论的差异。

与执着名相，将兴趣点集中在纯理论探索的文献史学者不同，新世纪以来，大多数考古学家已经“悄悄地转向比较实在的资料研究中去了，这绝非意味着他们对这类问题丧失了兴趣，而是意识到，与其在这类笔墨官司上耗费时间，不如通过对考古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历史理论”^[39]。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世纪前后的中国考古学家非但不关心“酋邦”理论为代表的概念论争，甚至不太在意一切概念指导下的理论“归纳”。这其中既有中国考古学的史学传统影响，更重要的是在于，对于过去类似五种社会形态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概念对具体问题研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让中国考古学家更加审慎地对待理论概念先行的研究方法，而更愿意从具体问题的研究开始，通过大量个案的积累去提炼、归纳、升华为总结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论概念。

二 考古学的新发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牵涉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新发现不断涌现，不少新发现甚至可用颠覆性来形容，为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视角。层出不穷的新发现这里无法一一详述，仅就个人认为特别重要的发现略述一二。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发现有二，一是张家港东山村崧泽文化聚落与墓地的发现；另一个则是良渚遗址群考古工作的突破。前者将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史前社会重大转型时间从距今 5500 向前推进了至少 300 年左右。后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演进的核心遗址，近年来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水利设施，在良渚社会的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的差异无不反映着当时长江下游地区复杂的社会分化和结构，也昭示了其高度发展的文明化成就。

在长江中游地区，新发现可以确认，两湖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在公元前 2500 年前后先后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可以称之为早期国家阶段了。天门石家河城址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史前城址群和澧阳平原以澧县城头山为中心的史前城址

群内显然有不同的功能区域规划，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较完整的聚落体系。^[40]

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先后发现了至少 8 座史前城址，说明宝墩文化时期表现出多中心并存的局面。从目前情况看，宝墩文化各城址的营建聚落选址完全是因地制宜。近两年宝墩遗址外城的确认，以及城内多组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说明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的成都平原能够调集大量人力物力修筑城址，已发展到一定的复杂程度，出现了早期文明因素，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

在黄河中游地区，对豫西铸鼎原周边地区的系统调查显示，在庙底沟时期，三级区域等级结构的出现是当地社会复杂化的重要证据。灵宝西坡遗址超大型房屋、西坡遗址同时期墓地的四级结构和特殊葬仪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该地区庙底沟时期社会复杂化的直观证据。

在晋陕高原，以神木新华、府谷郑则峁、佳县石擦擦山、兴县碧村等区域性中心遗址的发掘，揭示出河套地区与南流黄河两岸在文明化进程中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道路。而石峁遗址超过 400 万平方米石构“三重”（皇城台、内城、外城）城址的发现彻底颠覆了学术界既往对该地区的认识。连续惊人的发现说明，晋陕高原地区聚落大小有差异，分化程度高等级非常高，与中原和长江流域聚落模式都不太一样。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北方地区的史前社会是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新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对进一步理解“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在陶寺，新世纪以来的考古突破集中在陶寺城址在不同的时期城址布局和功能分区有变化。“观象台”的发现令天文史学界十分振奋，文献史家据此认为与文献记载的尧时期“观象授时”有一定的联系。^[41]区域系统调查结果显示，以陶寺遗址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多级分层的聚落社会组织，有较严密的社会控制网络。宏观和微观聚落形态的研究表明，陶寺可能已经进入初步发达的国家文明社会。

差不多同时，中原腹心地带也出现了双重城圈的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博爱西金城、新密新砦、平顶山蒲城店、濮阳戚城、温县徐堡等为

代表的多座城址，似乎更加印证了中原地区“满天星斗”、“小国林立”的政治图景。

二里头遗址的新世纪考古工作令人振奋，不但确认了遗址内存在专门为贵族居住的宫城及精心规划布局的道路网，还有带有围垣的官营手工业作坊。社会生产力较龙山时期有了长足发展，文化向外有极强的辐射作用。考古研究显示，从龙山时代晚期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阶段，以中原腹地地带为中心的地区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整合与转型。可以确认，二里头遗址有成熟的礼制，阶层分化复杂、明显，所代表的社会已不是简单的地区城址，而是一派王朝气象。

三 考古学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新阐释

新世纪以来，考古学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新阐释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案研究

从对进入文明与否的性质与标准判断研究，迈入到文明与国家形成的过程研究，是考古学对中国古代国家研究最大的贡献。通过近 20 年考古学界的研究，包括文献史学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学者，明白了所谓诸如城市、文字、金属冶铸技术这样的“文明形成要素”或“标准”本身的形成过程并非同步或者单线进化的。

同时，苏秉琦先生所指出的“满天星斗”说也逐渐为历史学界所领悟，明白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史前文化是多元演进的，而文明和国家的起源又是长期的过程。要想将中国古代国家起源梳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线索，就需要针对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具体研究，将宏观整合研究建立在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正如赵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研究者都没有把他们的研究对象作为验证某种普遍理论的资料，而是努力在具体的情况中总结出有关这个具体历史过程的若干看法”。

新世纪以来，这种分区域、分时代的个案研究已经产生了一批成果。比如韩建业对北方地区、^[42]张弛对长江中下游地区、^[43]郭伟民对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44]戴向明、^[45]许永杰^[46]与余西云^[47]对黄河中、下游地区、李伊萍对海岱地区的区域性个案研究；^[48]钱耀鹏对中国史前城址的专项讨论^[49]都将视野拓展到区域社会的演进之中。

戴向明通过陶器专业化生产探讨社会组织结构与分工变化、^[50]刘莉与陈星灿对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探索，^[51]张弛对史前葬仪所反映的权力与信仰观念的系统梳理，^[52]何努利用物质文化遗产对精神领域问题的研究^[53]等，代表了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新学术取向。^[54]

对中原地区的国家起源进程，赵辉认为伴随着中原龙山文化群的出现，在“多元一体”中出现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各地方社会文明化进程上的多样性可以总结为两个基本模式——“南方模式”是指在自然环境较好的东南地区，社会复杂化与分层化的程度较高，有一套相对复杂的等级表征系统，聚落之间和聚落群之间呈现出清晰的等级秩序，为维护等级秩序，宗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北方模式”是指自然环境相对较差的西部和北部旱作农业地区，社会分化程度普遍较低，缺乏等级表征系统，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更多地体现在聚落间和聚落群之间。后者常常可以见到冲突和暴力的现象。中原地区的社会文明化是以所谓“北方模式”为基础的。^[55]

韩建业在一系列论著中对早期中国文化整合和文明演进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最新出版的专题研究中，他从中国文明的产生时空背景和过程入手进行分析。他将铜石并用时代中国大部地区普遍发生的变化总结为三点：1.父系家庭和家族的凸现；2.家族公社群的普遍出现；3.战争频繁发生。他认为这三个特征是公元前 35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间普遍出现的现象，但在以黄河、长江下游为核心东方地区；以黄河中游的北方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表现略有不同，其差别可总结为古代社会发展的“东方模式”、“北方模式”与“中原模式”。^[56]

与大多数学者的认识有点差别，李润权认为，仅以现有的大型夯土基址、青铜容器、存在等级区分等现象不能证明二里头已经进入国家阶段，同样的现象可以发生在酋邦阶段。但从二里头文化的控制组织结构所反映的遗址空间分布来考虑，则遗址等级和空间的组织是典型国家社会的产物。^[57]而叶万松认为前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实现了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出现了私有财富，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酋邦古国；在距今



4300~3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奴隶制国家。^[58]

长江中下游地区国家起源的研究中,张弛详细分析了两湖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分布区的聚落与社会,认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若仅以面积而论,中心聚落石家河遗址甚至大于二里头遗址,同等范围的聚落密集度也超过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但其政治或经济控制力能否大于二里头则不清楚,或许可以将这一社会认为是中国古代典籍所描述的古国时期。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兴盛和衰落并非长江中游的孤立事件。^[59]

朔知对长江下游玉石器制作地域与时间、使用的人群、使用形式和理念等问题进行了通盘梳理,认为这一区域的玉石器分野起始于凌家滩时期,而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体现了社会的分层形态与演化的多样性。^[60]

裴安平对澧阳平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史前私有制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距今6500年前后私有制就已经产生,其起源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也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因为稻作精耕导致的社会基本矛盾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史前私有制的发展导致了等级与贫富差距的拉大,造成社会分层现象加剧。^[61]

2015年由严文明牵头,多位学者分工协作,对中原、海岱等地区史前聚落演变与文明化进程的分区综合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大体上反映并总结了近20年来中国学者对不同区域内多元演进过程与不同文明化模式的研究成果。^[62]

(二) 多学科联合研究

考古学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新阐释的第二个表现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介入,带来了国家起源问题的阐释体系多元化。新世纪以来,这种研究方式在考古学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取得了耀眼的成果。多种科学技术手段在中国考古学中的探索和运用,新石器时代考古扮演了先行者和实验者的角色。新技术的使用,不仅仅是分析检测技术的更新,更是研究视野的革命,所引起的是诸如作物驯化与种植、畜力使用与动物资源获取、贵资源开发、早期冶金技术、经济与生业模式等课题蓬勃发展。在相关专门化课题不断取得

成果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中国古代国家起源新阐释体系的多元倾向。通过经济与生业技术研究,考察经济地理以及与此相关的聚落形态、人类行为模式甚至精神层面的取向,借此揭示早期国家的政治活动,描述早期国家形成过程,并最终提炼升华为有关的理论模式,跟中国考古学界熟悉的从社会分层入手讨论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方法截然不同。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相关研究的突破,这些问题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

一系列动植物考古研究个案^[63]表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逐步发展起的稻作与粟作混合农业经济^[64]和以家猪为主的家畜饲养模式,^[65]是中原地区国家形成的经济基础。农作物栽培的差异导致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经济区的形成。随着不同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各经济区内都出现了富于地方特色的地方经济和手工业体系,也因此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核心经济,生产出的奢侈品手工业为贵族所垄断,贵族手工业成为手工业进步的主流。核心经济区的形成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冲突加剧和核心集团对资源垄断的结果。^[66]

李延祥与陈建立等开展的一系列调查与综合研究,对冶金技术的在中国的传播、交流与技术本土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发现从距今4000年开始,中原、辽西、河西地区普遍出现了大规模的青铜冶金活动,不同地区形成了各自的青铜产业格局,不同格局背后是不同的管理机制即政权发育程度。^[67]张海与陈建立认为就中原地区而言,缺乏制作高档奢侈品的原料和技术,贵族阶层的成长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青铜冶铸业适应了这一需要,对中原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该地进入早期国家的关键性推动力量。^[68]

新世纪以来,在国外学者的协助下,以李水城、燕生东为代表的学者对山东半岛和峡江地区的盐业考古进行了开拓性工作,对中国早期的盐业资源开发、利用及其背后的政权组织模式进行了突破性的探讨。^[69]这一研究填补了中国学术界的诸多空白。

刘莉与陈星灿格外注重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对于资源的控制与利用。他们提出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与某些独特的地理结构、重要资源的分布、开采和运输、政治和经济组织及信仰系统有密切

关系。他们认为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可能还不具备国家水平的社会组织。最早的国家水平的社会，是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开始的。二里头文化是考古上可以辨认的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水平的社会；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商周王朝的第一个王朝夏的物质遗存。^[70]

人地关系在中国文明与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有巨大的影响力。对不同区域的环境考古个案研究将多元演进过程中不同区域文明与方国所受到的环境影响，展现在了研究者面前。^[71]在此基础上，考古学家也开始尝试通过环境与人地关系来分析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72]

（三）整合研究

考古学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新阐释的第三个表现是，宏观研究逐渐脱离了简单的理论模型与古代文献比附，开启了多学科多视角的整合性研究，有多部中国文明或国家起源研究的整合性专题著作刊布。^[73]

严文明在“重叠花瓣”式的阐释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原地区成为文明要素辐辏之地，并最终率先进入了国家阶段的原因。他认为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铜石并用时期，中原、黄河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西辽河流域等五个区域相继开始走向文明以至产生了最初的国家。他把这个现象和趋势高度概括为“多元一体”。他认为对于社会形态的定性不必执着于某个特定概念。^[74]这一观点一经提出，迅速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并成为后来研究的新起点。

张忠培反对以“酋邦”概念来简单归纳中国古代文明或国家起源的复杂状况，强调不该以某种模式空谈社会状况而不对材料进行具体分析。^[75]他认为黄河、长江中下游、燕山南北与西辽河流域差不多都在同时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各地自有起源路径，当时社会并无绝对的中心可言。他发现处于文明阶段的社会中单偶制家庭更多地位更强，父权家庭已经成为各地的基层社会单位；阶层分化十分明显，贵族已控制了氏族，劳动与社会分工已经在家庭层面展开；聚落也发生了分化，出现了城乡分野，统一考古学文化内有诸方国割据；祀与戎已经发展为神权和王权；军权演变为王权，军（王）权超越神权而凌驾于神权之上。^[76]

李伯谦在一系列新的论文中，^[77]对中国早期

文明演进的模式提出了反思，认为中国文明演进的模式并非遵循神权—王权—帝权的道路，实际情况可能复杂的多。他提出中国文明的演进有三个阶段两种模式，认为酋邦、王国、帝国是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三个主要阶段，突出神权还是突出军权—王权，则是不同的两种文明模式。前者以红山、良渚为代表，神权大于王权是古国阶段的特征。王国是王权国家，国家的主宰是通过战争涌现出来的军事首领，是军权与王权集于一身的人。随着历史的演进，神权不断衰落，最后让渡于王权。王国阶段也开始产生维护、实行这些权力的制度，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帝国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他认为判断文明形成与否的标准既不是物化的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大型礼仪建筑四要素，也不是聚落分级，而应该是以仅仅抓住“国家是文明的核心”进行综合分析。

郭大顺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存在三个大的文化区：以彩陶、尖底瓶为主要文化特征，粟作农业中原文化区；以鼎为主要考古学文化特征，稻作农业的东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区；筒形罐为主要文化特征，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北文化区。距今5000年左右为界，可将三大区域的社会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三大区域以发展个性为主，形成了各自的发展道路，亦即“古国”时代；而在这之后，三区域逐渐进入了最初的文化共同体形成时期，向“方国”时代过渡。^[78]

刘莉与陈星灿认为国家形成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没有任何一种描述和理论可以回答所有问题并且对所有考古材料做出合理解释。他们认为中国最早的国家，是以核心地区的庞大城市中心支配富有重要自然资源的边缘地区为特征。因此，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的国家更接近“地域国家（territorial-states）”性质。^[79]值得注意的是，在二位学者共同撰写的著作尤其是英文著作中，他们比较明确地使用“酋邦”来描述中国古代的前国家阶段，但在陈星灿先生个人论著中，则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十分审慎。但从另一个方面讲，使用酋邦概念对中国材料的解读，可能会让国外学术界认为酋邦理论在国内影响很大，但实际上这个影响可能恰恰相反。



王巍对文明、国家进行了定义,明确指出文明和国家是不同范畴的概念。他提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是在国家管理下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文明是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部分组成的”,而“国家是凌驾于社会各个阶层之上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它是为统治阶级所掌控,主要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国家的主要职能是社会的管理,是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其实现职能的手段有强制的暴力和非强制的暴力。前者依靠军队、法律等国家机器,后者包括宗教信仰、伦理规范等”。^[80]

赵辉与魏峻梳理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情况,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修筑原因存在地区差别。虽然各地的城址出现时间、目的和修筑性质、技术传统有所差异,但这些城址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也各有自己的贡献。^[81]

钱耀鹏从多个角度对龙山时代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龙山时代的社会结构已经相当复杂,较大程度地超越了氏族部落以及所谓酋邦阶段,明显具有国家的性质。虽然社会结构中还带有较浓厚的血缘色彩,但也难以作为否定其社会阶段进步的证据,相反恰恰反映出早期国家脱胎于氏族社会所应有的特点。纵观龙山时代的社会进步程度,视之为中国原史时代初期似乎比较合适。^[82]

张弛则从墓葬所出发,讨论由墓葬和墓地所见的社会分层与血缘等级制度,再进而观察这些社会分层所体现的社会权力分层。他认为,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期的阶段,长江、黄河及西辽河流域都已经出现了由墓葬和墓地表现出的社会分化现象,体现出部分人群开始占据社会的最高权力;而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时期,等级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体现出了新型社会的样态,不排除已经超越了城邦或邦国形式,已经进入了邦国联盟甚至王国的可能。^[83]

许宏认为二里冈时期是目前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两大话语系统能够契合的最上限。他提出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仰韶时代后期与龙山时代(约前3500~前2000年),处于文明化或国家化进程中,是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的阶段,或可称为“多元

的古国文明”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二里头时代至西周时期,是华夏文明社会的正式形成阶段,或可称为“一体的王朝文明”或者“广域王朝国家”时期。从宏观态势看,二里头都邑及二里头文化崛起于中原腹地,作为“国上之国”的广域王权国家,东亚大陆首次出现了以高度发达和强力辐射为特征的核心文化。^[84]

面对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以谢维扬为代表的学者从两个层面对考古学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其一,对考古学界认可的“古国”概念提出质疑。他认为,将“古国”确认为国家,考古学证据的认定上存在缺陷,缺乏对国家制度存在与否的自明证据。他认为“古国”是一个不包含关于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的概念,天然地会放弃对国家形成前夕可能存在的,接近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形式“酋邦”的探讨,且古国理论在与古代文献总体内容“内核”关系也需要做出合理的解释。以良渚为例,他认为假若良渚社会是古国,但在后代描述夏代同时期前后国家的记载中,却没有关于良渚古国的记载,所以良渚必然不处于国家阶段。^[85]其二,在涉及国家制度形成的问题上,对考古学证据单独发挥作用的能力提出质疑,认为考古学能够研究古代国家起源问题仍然取决于:1.早期国家理论需要进一步成熟与完善;2.需要更过硬的直接证据以证明国家存在。简言之,考古学需要举证出有关社会的政治制度是正规或正式的证据,亦即直接证明政体形式化水平的证据。他以只有发现反映官署活动的文字证据(如金文)以及官印、符信之类,才能确定进入了国家状态。假若不能发现,则考古学的逻辑推导实际无效。^[86]

应该说,谢维扬等学者的意见从逻辑上或可成立,但这一研究逻辑是基于埃及与近东古代国家经验而言的,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远东和其他不少古代文明而言漏洞明显。首先,“古国”究竟是一个描述性的状态,还是一个有确定内涵与外延的界说性概念,还没有定论。考古学界更没有作茧自缚到把这一概念限定为不具有前国家阶段的内涵。在基础材料和个案研究尚不充分的前提下,执着于叫什么概念,并不利于研究。使用“古国”描述,也并非放弃了对前国家状态的研究。其次关于考古学证据的效力问题,类似官

印、符信、官方档案文书之类的证据对于国家性质认定并非必要条件，在中国且不说一定能够被确定发掘或发现，即便到了已经确定进入王朝阶段的商与西周时期，使用符信与否也尚待讨论。这不仅仅是考古发现的原因，也是由中国古代国家行政运作机制的特点所决定的。放眼环宇，其他诸古代文明（比如玛雅、古印度文明、古代日本），也并不能以官印、官方文书档案的有无作为判断是否进入国家阶段的标准。至于部分学者质疑后代描述夏代国家的文献中未见良渚的记载，则是因为并未能清良渚文化年代关系。

四 总结与展望

浮光掠影般匆匆回顾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研究，可以看到十余年来新发现数量与性质令人欣喜，相应的研究也开拓出了不少新的领域。从理论上讲，对复杂的中国古代国家起源问题，所涉及的研究应该包括物质文化、地区差异、经济基础、技术传承、资源利用、商品贸易、行政制度、人群迁徙流动、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在未来的国家起源研究中，我们还有大量尚待开拓的领域，比如，早期文字与权力、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农业与动物驯化在早期国家中的支撑作用、产量与经营模式；早期贸易与赋税；早期技术与资源的控制、传播以及贵重物品的再分配；早期人群的流动与婚姻、家族形态；早期国家区域中心与周边聚落的控制关系、是否存在地方行政机构、官僚等问题都是中国学术界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此外，由于中国考古学产生的背景和悠久的历史文本书写传统，对于考古学文化与传说人群的对应关系、与传世历史文献的对应关系等理论问题亦须在理论角度有进一步的突破。现有的研究，有的只是开了个头，有的还在翘首期待材料的阶段。现有研究远远未能穷尽复杂的“国家”内涵。

分析新世纪以来国家起源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恰恰是以考古学研究为核心，以基础材料为依据，多种学科手段共同努力，才能使众多在 20 世纪尚不可预见的研究方法、结论在新世纪中纷纷涌现。今日的研究成就，似乎恰恰应了严文明先生的期待——“全方位研究中国文明，需要以考古学为基础”。

考古学家开始从研究社会的角度，以历史学、政治学的语言去描述考古学学科的材料，这是考古学学科前进的体现；与之相应的是，历史学家、政治学、社会学家采用考古学材料去构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理论模型，完善与修订相关概念，说明考古学材料实际上已经成为早期国家研究的核心与导引。

回顾科学史研究范式革命的规律时发现，任何学科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是在基础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针对新出现的材料与问题才会有可能突破。用一成不变的理论、概念，无法解决复杂甚至渺远的古代国家起源问题。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富有创造力的心态去处理具体问题，而不是满足于去验证某种既定的理论模型。

附记：本文的撰写得到了陈星灿、辛德勇教授的帮助；赵辉教授、商周田野工作坊诸友及王辉博士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 [1] 赵辉：《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 2 卷，第 1~12 页，文物出版社，2003 年。
- [2]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 年第 6 期。
- [3] a. 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 年第 10 期；b. 赵辉：《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 2 卷，第 1~12 页。
- [4] 赵辉：《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 2 卷，第 1~12 页。
- [5] 对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或国家形成研究，十余年来亦曾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西方概念比较等方面进行过综述，如：a. 马丽丹：《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的研究综述》，《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 年第 12 期；b. 巴新生、李友东：《探讨中国国家起源的几种理论模式的回顾和思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c. 范毓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史学月刊》2008 年第 10 期；d. 杨博：《中国学者关于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概要》，《高校



- 社科动态》2007年第5期；e.杨博、雷鹤宇：《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深入研究的典范——沈长云、张渭莲新著〈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评介》，《高校社科动态》2009年第6期；f.胡玉娟：《全球视野下跨学科的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古代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g.高江涛：《新世纪以来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回顾和反思》，《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h.高江涛：《恩格斯国家理论与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9日第7版。但由于学科背景所限，上述这些述评总结过分关注于理论模型和概念的讨论，对于建立这些模型的基础材料研究进展如何却少有涉及。对于这些概念与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材料；中国材料本身的研究进展；支撑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物质遗存本身研究进展几乎没有论及。我个人认为，在确定某种理论模型和概念适用之前，最好还是应该对现有的材料和对材料的基础分析清一清“家底”，才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 [6]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 [7] a.易建平：《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b.易建平：《部落联盟还是民族——对摩尔根和恩格斯有关论述的再思考》，《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c.易建平：《从词源角度看“文明”与“国家”》，《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d.易建平：《从平等社会到国家》，《怀化师院学报》2009年第12期；e.易建平：《伦斯基的园耕社会理论与谢维扬的酋邦学说》，《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f.易建平：《酋邦与中央集权》，《史林》2001年第4期；g.易建平：《酋邦与专制政治》，《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h.易建平：《社会规模与早期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化》，《世界历史》2006年第5期；i.易建平：《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j.易建平：《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非专制酋邦与早期国家》，《史林》2004年第1期；k.易建平：《祖鲁与酋邦模式》，《四川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l.易建平：《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需要建立国际背景》，《社会科学报》2003年7月3日第5版；m.易建平：《东方自古以来专制论不可靠》，《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6日第4版；n.易建平：《文明与国家起源新解——与范毓周、王震中等学者商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8月11日第5版；o.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 [8] 易建平：《关于国家定义的重新认识》，《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 [9] 谢维扬：《中国国家起源中的“古国”问题》，《学术月刊》2001年第4期。
- [10]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一些概念意义的理解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
- [11] 沈长云：《酋邦早期国家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 [12] a.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b.沈长云：《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论纲》，《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 [13] 范毓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 [14] a.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b.陈淳：《国家起源之研究》，《文物季刊》1996年第2期；c.陈淳：《社会进化模式与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d.陈淳：《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问题》，《东南文化》2002年第3期；e.陈淳：《早期文明的标准与解释》，《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f.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 [15] a.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b.王震中：《邦国、王国与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c.王震中：《夏代“复合型”国家简论》，《文史哲》2010年第1期；d.王震中：《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e.王震中：《关于古代国家的概念定义与标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编：《考古学研究》九，第748~767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f.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论纲》，《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6期；g.王震中：《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的理论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3、4期；h.王震中：《国家形成的标志之管见——兼与“四级聚落等级的国家论”商榷》，《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i.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j.王震中：《应重新认识古代国家形成标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28日第8版。
- [16] 易建平：《部落联盟还是民族——对摩尔根和恩格斯有关论述的再思考》，《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 [17] 易建平：《从平等社会到国家》，《怀化师院学报》2009年第12期。
- [18] 张童心：《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思考》，《忻州师范

- 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 [19] 沈长云：《古代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不宜否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28日第8版。
- [20] 王三义：《“部落联盟模式的由来”——易建平〈部落联盟还是民族〉一文引发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 [21] 杨共乐：《对国家起源问题的再思考》，《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
- [22] 王东：《中华文明论——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哲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 [23] 袁方成、张翔：《从原始孵化到成长构建：氏族与国家起源的再识》，《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 [24] a.叶文宪：《“国家”与“文明”辨析》，《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b.叶文宪：《论西周国家性质——中国早期的部族国家》，宫长为编：《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生七十岁文集》，第143~157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5年。
- [25] 李宏伟：《两种国家起源模式的比较研究——国家起源道路新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 [26] 韩东屏：《国家起源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
- [27] 晁天义：《重新认识国家起源与血缘、地缘因素的关系》，《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
- [28] 王宇信等：《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 [29] 晁福林：《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一个理论思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 [30] 王奇志：《读〈史记·五帝本纪〉论黄河中游早期国家形成的时间》，《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 [31] 尹宏兵：《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分析》，《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
- [32] 缪雅娟：《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思考》，《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
- [33] 袁建平：《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的邦国与方国》，《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 [34] 王晖：《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兼论“满天星斗”到黄河中游文明中心的转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 [35] 李学勤：《论遂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第126~13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36] 李学勤：《近年出土文献与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三代文明研究》，第10~14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
- [37] 李伯谦：《考古学视野的三皇五帝时代》，《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36期，2008年。
- [38] 赵辉：《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2卷，第1~12页。
- [39] 赵辉：《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2卷，第1~12页。
- [40] 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 [41] a.武家璧等：《陶寺遗址观象台的天文功能与年代》，《中国科学G辑》2008年第9期；b.李勇：《世界最早的观象台——陶寺观象台及其可能的观测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
- [42] a.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b.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c.韩建业：《先秦考古研究：文化谱系与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2013年；d.韩建业：《先秦考古研究：聚落形态、人地关系与早期中国》，文物出版社，2013年；e.韩建业：《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6年；f.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2卷，第84~96页；g.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43] 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 [44] 郭伟民：《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文物出版社，2010年。
- [45] a.戴向明：《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与社会》，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3卷，第15~39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b.戴向明：《中原地区早期复杂社会的形成与初步发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编：《考古学研究》九，第481~527页；c.戴向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编：《考古学研究》十，第539~581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 [46] 许永杰：《黄土高原仰韶晚期遗存的谱系》，科学出版社，2007年。
- [47] 余西云：《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科学出版社，2006年。



- [48] 李伊萍：《龙山文化：黄河下游文明进程的重要阶段》，科学出版社，2004年。
- [49] 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 [50] 戴向明：《陶器生产、聚落形态与社会变迁：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垣曲盆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 [51] a.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卷，第71~134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b. Li Liu and Xingcan Chen.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1；c. Li Liu and Xingcan Chen. State Formation and Early China.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2003。
- [52] 张弛：《社会权力的起源——中国史前葬仪中的社会与观念》，文物出版社，2015年。
- [53] a.何弩：《试论都邑性聚落布局的宇宙观指导理论——以陶寺遗址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五，第19~37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b.何弩：《都城考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从陶寺城址和二里头遗址都城考古分析看中国早期城市化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三，第3~58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 [54]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一一介绍新世纪以来的所有研究具体内容，仅以中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研究为例则略作介绍。
- [55] a.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b.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
- [56] 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57] 李润权：《资讯革命和国家起源——兼谈二里头是否进入国家社会》，《北京论坛（2004）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东亚古代文化的交流”考古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2004年。
- [58] 叶万松：《中国文明起源“原生型”辩证》，《中原文物》2011年第2期。
- [59] 张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聚落与社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编：《考古学研究》十，第324~351页。
- [60] 朔知：《长江下游的“玉石分野”与社会变革——以五地墓葬材料为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编：《考古学研究》九，第539~574页。
- [61] 裴安平：《史前私有制的起源与发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编：《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第147~156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 [62]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2015年。
- [63] 新世纪以来对中国古代技术与经济的研究个案甚多，无法一一介绍，其研究在部分成果汇编中可见一斑。比如 a.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技术与经济卷》，科学出版社，2009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5年；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3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e.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4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
- [64] a.赵志军：《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特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期；b.赵志军：《关于夏商周文明形成时期农业经济特点的一些思考》，《华夏考古》2005年第1期；c.赵志军：《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2辑，第1~11页；d.赵志军：《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年。
- [65] a.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b.袁靖：《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c.袁靖：《中国动物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15年；d.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科学出版社，2012年。
- [66] 张弛：《中国史前农业、经济的发展与文明的起源》，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卷，第35~57页。
- [67] a.陈建立：《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文明新探》，科学出版社，2014年；b.李延祥：《中原与北方地区早期青铜产业格局的初步探索》，《中国文物报》2014年2月28日第5版；c.梅建军：《关于中国冶金起源及早期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古代文明研究》，第168~179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 [68] 张海、陈建立：《史前青铜冶铸业与中原早期国家

- 形成的关系》，《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
- [69] a.燕生东：《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文物出版社，2013年；b.李水城、罗泰主编：《中国盐业考古：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景观考古的初步研究》第1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c.李水城、罗泰主编：《中国盐业考古：国际视野下的比较观察》第2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d.李水城、罗泰主编：《中国盐业考古：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中坝遗址的考古研究》第3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e.王青、朱继平：《山东北部商周时期海盐生产的几个问题》，《文物》2006年第4期。
- [70]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
- [71] 此方面的研究部分可见于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环境卷》，科学出版社，2009年。另外，部分个案研究的成果，对于丰富中国古代国家起源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如a.张俊娜、夏正楷：《中原地区4ka BP前后异常洪水事件的沉积证据》，《地理学报》2011年第5期；b.史辰羲等：《浙江良渚遗址群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地学前缘》2011年第3期等。
- [72] 考古学家对环境的宏观考量，如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 [73] 比如卜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4部研究专著：a.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7年；b.卜工：《历史选择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9年；c.卜工：《中国模式解读早期中国》，科学出版社，2011年；d.卜工：《中国DNA——早期中国、古礼天下》，科学出版社，2014年。
- [74] 严文明：《重建早期中国的历史》，《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2009年。
- [75] 张忠培：《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2年第5期。
- [76] 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
- [77] a.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b.李伯谦：《张家港市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启示》，《文明探源三代考古论集》，第55~59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c.李伯谦：《从崧泽到良渚——关于古代文明演进模式发生重大转折的再分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编：《考古学研究》十，第517~539页；d.李伯谦：《关于文明形成的判断标准问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44期，2010年；e.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44期，2010年。
- [78] 郭大顺：《三大区交汇与中国文明起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编《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第96~107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 [79] 同[51]。
- [80] 王巍：《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第一届中瑞考古学论坛文集》，第18~29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 [81] 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展与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卷，第1~34页。
- [82] 钱耀鹏：《关于龙山时代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陕西省文物局等编《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纪念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论文集》，第308~318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 [83] 张弛：《社会权力的起源——中国史前葬仪中的社会与观念》，文物出版社，2015年。
- [84] a.许宏：《“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文物》2001年第2期；b.许宏：《略论二里头时代》，王宇信等主编：《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66~3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c.许宏：《从二里头遗址看华夏早期国家的特质》，《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d.许宏：《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9集，第186~204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e.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f.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的中原图景》，三联书店，2014年；g.许宏：《再论城市（都邑）是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对早期文明探索中聚落研究方法的提倡》，《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h.许宏：《宫室建筑与中原国家文明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五，第3~18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 [85] 谢维扬：《中国国家起源中的“古国”问题》，《学术月刊》2001年第4期。
- [86]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考古学证据的认定和相关理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